

潮州歌册的艺术特色与传播价值

谢梓润

摘要：潮州歌册是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在2008年被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潮州歌册用潮汕方言演唱，约莫在清朝诞生，直至民国时期都流传广泛。它诞生于潮汕地区，以潮汕方言为语言特色，在风俗、文化等各个方面均有鲜明的特色。它并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审美娱乐价值的说唱艺术形式，还承载着潮汕的风俗文化以及历史故事，是潮汕地区传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。本文从潮州歌册的文化背景出发，阐述了其形式与内容特点，又通过对潮州歌册的分析，来阐述其传播价值以及传播手段。

关键词：潮州歌册；民间说唱；传统文化；传承传播

一、引言

“潮州歌册是流传于潮汕地区的一种长篇叙事诗。”^[1]从音乐特征上看，它具有吟唱性以及叙事性，用于日常生活中对孩童、妇女的教育。因此，它对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从其演唱形式、音乐特点以及内容上看，虽潮州歌册中带有“歌”字，但其类别应归为说唱音乐更佳。肖惠卿老师的文章中，也曾提及：“与之相对应，在现阶段说唱低迷的情况下，将歌册归纳在说唱文学乃至主流文学的范畴内，分析潮州歌册文学性状与审美意义，是做好歌册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思路。”^[2]笔者将从潮州歌册的文化背景、形式内容特征以及传播价值与手段三方面进行分析，最后总结出潮州歌册的艺术特色。

二、潮州歌册的文化背景

潮州歌册用潮汕方言演唱，约莫在清朝诞生，直至民国时期都流传广泛。关于潮州歌册的溯源至今尚无定论，目前多认为是从江浙一带的弹词发展而来或是吸收本土歌谣、畚歌以及戏曲发展而来。潮州歌册诞生于潮汕地区，距今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。潮汕地区以潮汕方言为语言特色，在风俗、文化等各个方面均有鲜明的特色。首先，潮汕地区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。作为一个沿海地区，潮汕人多擅于经商，因此他们多与外地人打交道，能够更好地接受外来文化。其次，潮汕地区的人民具有团结互助的

精神，这与他们本土的宗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。潮汕地区有着十分浓重的民族文化，并延留至今，通过不同的民俗活动进行展现，例如“赛大猪”“营老爷”等。浓重的民族文化让他们对地域及同地域的人民产生信赖。加上潮汕人多外出经商，因此形成了出门在外互帮互助的习惯，并延续至今。最后，潮汕地区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，他们一方面通过民俗活动祈盼来年的生活能够更加顺利，另一方面，他们也通过民俗活动增强氏族之间的情谊。

因此，潮州歌册大多数是建立在上述的文化背景基础之上，讲述潮汕的历史故事、贸易活动、宗族关系等内容。这为我们研究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较多的参考文本，也让我们更直观地从民众的角度感受潮汕地区的文化传统。可见，潮州歌册并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审美娱乐价值的说唱艺术形式，它还承载着潮汕的风俗文化以及历史故事，是潮汕地区传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三、潮州歌册的形式与内容

作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，潮州歌册并不像其他说唱一样是由职业或半职业艺人表演。它通常是劳动人民口口相传，承担着教育子女的用途，或用于女性平日工作解闷。缺少了职业艺人的完善，歌册的形式结构大多数是通过借鉴其他民间艺术形式而成的，例如潮州戏曲、潮州歌谣或外来曲种弹词等。

1. 潮州歌册的形式结构

潮州歌册的表演形式为徒口演唱，没有乐器伴奏以及人声伴唱，通常为单独一人清唱。“它在形式上以七言为主，每四句为一组，首句入韵，每组转韵，属诗赞系说唱文学。”^[2]

它的独立结构为单集，但集与集之间常常会有联系，构成系列说唱的话本。因此，存在多种称谓来反映歌册集与集之间的关系。例如“下棚”的称谓，如“《萧光祖玉盒仙琴金宝扇》与《萧光祖下棚宝鱼兰》《五美缘》与《五美缘下棚》《双太子红罗衣》与《双太子下棚禹龙山》。上、下棚之间，有时除共有名称外，还各有另一名称突显本棚故事情节，如《双退婚》上棚又称《鸾凤图》，《双退婚》下棚又称《紫荆亭》；但有时也仅简单地用上、下棚来区别，如《六奇阵》与《六奇阵下棚》”^[2]。上棚与下棚之间有时是续集关系，其角色及故事大纲基本延续；有时仅是相同的时代背景或故事背景，但人物与故事发展没有太多必然的联系。另外，还有“下载”“下部”“下卷”“下集”“子”“连”的称谓，其中“下载”用来指代续集；“下卷”用来标示章节；“下集”同样用来标示续集；“子”用来标示前面故事与后面故事具有亲子关系，例如“《英台子》讲述的是梁山伯祝英台儿女梁承以及梁明月的故事”^[2]；而“连”则是用来标示多个歌册之间的顺连关系。

它的内部结构通常呈现以下特点。首先，歌册多在开篇时引用四句至八句七言诗或五言诗，通过引用诗歌的方式来介绍故事的背景。肖少宋老师认为“这是引用了章回小说的形式所遗留的痕迹”^[2]。其次，歌册通常会引用小标题来概括剧情。“如《灵芝记》第一卷下即分为：夫妻谈婚、夫人得病、钱氏仙游、三春买水、荐祭亡夫、朋友送葬、刘相劝婚、梁婆通信、梁婆说婚、荣娶云金、三春拜母，共十一节，设小标题十一个。”^[2]最后，潮州歌册中还会穿插说白用以说明情节或补充旁白等作用。

可见，歌册虽大多数作为女性日常业余唱诵使用，但其结构与文辞并不简单。首先，歌册结构庞大，一个故事常常由多集连载而成。其次，歌册单集内部常见七言结构，句式规整，韵脚灵活。七言结构中，多见“四三”句式，另外也会用到非七言结构，常见十字句。另外，由于潮汕方言声调较多，共有八个，声调的特殊化让歌册用韵相对

于其他地域而言更灵活一些。

2. 潮州歌册的题材内容

潮州歌册多数用潮州传统戏曲的故事作为题材。其原因在于潮汕地区的民俗活动常常与戏曲的演出相互联系，除了村中一年一度的民俗活动外，家族的喜庆之事，也需要戏曲的演出。因此，观戏成了潮汕民众日常的娱乐活动，直至千禧年，潮汕老一辈还保留着日常观戏的习惯。“民众将自己观看的故事编成了歌谣，概括成谚语，总结生活经验，训诫后人。”^[2]另外，潮州歌册也吸收了弹词以及广府木鱼书的题材，其题材之广泛令人惊叹。

四、潮州歌册的文化内涵

通过对潮州歌册形式结构以及题材的分析可见，潮州歌册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，不仅包括潮汕历史文化内涵，而且承载着潮汕劳动妇女的勤劳智慧，还具有道德教化意义的文化内涵。

首先，潮州歌册承载了潮汕地区的历史文化。潮州歌册多以潮汕戏曲的故事为题材。而潮汕戏曲中不乏多类讲述潮汕文化的故事。如书写潮州历史人物的故事《翁万达》《方提台》《柳知府》等。也有普通人民的故事，例如《五义女》《三义女》等。另外，其他传统历史故事，经过了歌册的改变，也会不自觉加入潮汕人民的文化里。因此，潮州歌册承载着潮汕地区的人文历史，包括历史故事的传承以及文化观念的传承。其中，宗族制度所形成的团结观念、光宗耀祖所形成的读书观念，让潮汕人民至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

其次，潮州歌册蕴含着潮汕妇女的勤劳智慧。由于潮汕宗亲制度的盛行，女子地位较低。较少能有学习或外出交流的机会，她们多数居家操持家务或农活，很难感受到外面宽阔的世界。但她们仍然能够从外来弹词、木鱼词以及潮汕本土戏曲学习韵文，并编纂成七言诗进行诵读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潮汕妇女得以有养成传统的道德观念、了解古代传统故事或古典文学，以此丰富自我精神世界。另外，从潮汕妇女角度讲述出来的故事，更容易带有传统妇女的视角。因此，研究潮州歌册可以更好地分析潮汕传统妇女的精神世界与思想观念。

最后，潮州歌册对整个潮汕人民的道德观念具有教化意义。潮州歌册影响的并非仅是潮汕妇女。它影响的是清

代直至民国几乎所有的潮汕人民。当时，潮州歌册不仅是妇女之间的传唱，它还会作为摇篮曲，唱给孩童听。因此，潮州歌册中的故事内涵对当时潮汕人民的三观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它包括宗族观念的渗入、读书考取功名观念的渗入以及传统道德观念的渗入。

五、潮州歌册的传播价值

1. 潮州歌册的发展情况与存在问题

目前，潮州歌册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危机。潮州歌册的内容已经被大量的记载下来，记录在册。但它的活态传承存在着较大的问题，仅有部分地区的老人能够念唱潮州歌册，且年龄高达百岁左右。可见，它很快会面临无人传唱的问题。

潮州歌册的传播出现较大问题的原因，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：第一，缺乏市场的介入，让潮州歌册难以发展。中国其他地域的说唱，大部分传播是依存于商业价值。例如苏州弹词或京韵大鼓。当说唱艺术有了市场价值之后，便会有大量的职业艺人演唱，为说唱艺术形式带来更高的活力与艺术价值。例如，京韵大鼓便是在市场的推动下产生了不少的流派，例如刘宝全的流派、骆玉笙的骆派等。而苏州弹词同样也有陈调、俞调以及马调等不同的流派特色。不同的职业艺人经过潜心钻研后，为该种说唱艺术增添了更为精妙的表演色彩。然而，潮州歌册却并不具备商业价值，它仅是潮汕妇女之间传唱的韵文。这使其本身的艺术价值相对于其他说唱艺术而言，便少了许多。第二，功能性丧失。潮州歌册的功能是为了给当时没有学习机会的潮汕妇女学习使用，但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在义务教育的普及下，潮汕妇女得到了更多的学习机会，到如今已经与男子有了同等的学习权利。因此，潮汕妇女不再需要通过歌册进行学习，其功能便丧失了。第三，以念诵为主，音乐性较低。潮州歌册的吟唱以念诵为主，并无过多演唱的部分，音乐性较低。因此，当它失去了本体功能意义之后，便很难受到大众的喜爱，引起自发地学习与传播。最后，潮州歌册一定程度上带有较重的传统观念，较难适应当代的大众观念与审美。

2. 潮州歌册的传播价值

尽管潮州歌册相对于其他地域的说唱形式而言，并无较为丰富的表演形式。但其文本所承载的潮汕文化以及文

本文化内涵，值得我们传播与学习。“它具备潮汕地域文化标本的保存意义。”^[1] 对其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潮汕传统文化。肖惠卿老师提出，“潮州歌册中的曲本资料不单单是用于吟唱的歌册文本，更像是民间方言与文化的立体展现，民间艺术审美智慧的物化表现。”^[2] 可见，研究、传播潮州歌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潮汕方言的美感，感受潮汕方言的变化。

3. 潮州歌册的传播手段

传播潮州歌册，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方式。第一，吸收潮州歌册文本，将其融入当代潮汕音乐创作的更多领域中来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潮州歌册。活态传承意味着我们不能够照搬原来的形式，从上述分析可知，潮州歌册的形式有较多不太符合当代人民的审美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摘取潮州歌册之精华，将其与当代的音乐创作进行融合。例如，在范宗沛的《摆渡人之歌》中，他便将苏州弹词这一说唱形式，融入钢琴、琵琶以及流水声的配乐当中，使两者完美适配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将传统说唱与当代音乐创作进行有效结合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。其次，丰富改变潮州歌册的表演形式，为其注入新的活力。最后结合文旅宣传，将潮州歌册的表演与潮汕的旅游发展相结合，带动潮汕旅游经济的发展。大多数旅游爱好者在城市打卡时，都希望能够体验当地的特色文化。因此，丰富潮州歌册的表演方式，使其成为潮汕地区旅游的特色文化体验项目，也是一个活态传承的方式。

六、结语

文章通过对潮州歌册的文化背景、形式内容、文化内涵、传播价值以及传播手段多方面进行分析阐释，得出以下结论。潮州歌册承载着悠久的潮州历史文化，它自清代兴盛，但却在现代没落。我们需要更多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，让它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。但由于潮州歌册本身所具备的功能性消失，加上其传承方式不同于其他具备商业价值的说唱形式。因此，它需要我们倾注更多的心血，将它与现代音乐风格以及技术融合，为其注入新的活力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肖惠卿，潮州歌册文学审美探究[J].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，2022(8).
[2] 肖少宋，潮州歌册研究[D]. 博士论文，2009.